



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方東美／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註冊商標

120(71-81)

新 儒 家 哲 學 十 八 講

著 作 者： 方 東 美
出 版 者：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台 北 市 信 義 路 二 段 二 一 三 號 十 一 樓 · 電 話 / 3952508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出 版 事 業 登 記 台 業 字 第 一 八 五 號
總 發 行 所： 台 北 市 長 安 東 路 一 段 五 十 六 號 · 電 話 / 5812741
門 市 部： 台 北 市 信 義 路 二 段 二 一 三 號 綜 合 書 城 · 電 話 / 3952501
 台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四 十 九 號 · 電 話 / 3116829
 台 北 市 林 森 南 路 一 〇 七 號 文 化 大 樓 · 電 話 / 3514221
 高 雄 市 五 福 四 路 九 十 五 號 · 電 話 / 5210416
郵 政 劃 撥： 帳 戶 0018061-5 號
印 刷 者： 利 達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地 址： 台 北 市 和 平 西 路 三 段 52 巷 29 號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二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四 月 再 版
定 價： 新 台 幣 (精) 160 元 (平) 120 元

■ 如有缺頁及倒裝，請寄回換書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弁言

本書係方東美先生在輔仁大學講授「宋明清儒家哲學」的錄音筆記。講授期間，起自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十八日迄於同年十二月三日，共十八講。由於本課程原訂爲一學年，方先生因病中途輟講，祇講到宋儒張橫渠。因此，本編纂委員會議決，暫定名稱爲「新儒家哲學十八講」。一方面保留了原課程的名稱；同時也表示了不得已的苦衷，用誌哀悼。期望讀者在這本「未完成的講錄」中，深體這位一代大哲的「孤詣」和「微言」。

至於未竟部份，可參考方先生英文著作「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

方先生於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十三日逝世。本講錄堪稱爲先生之生平「絕響」了。

本書係由方武、談遠平先生初錄，張永僑先生校訂，其中「第十一講」是由劉孚坤先生校訂。書中內容以原錄音爲準，如有漏誤由校訂者負責。各篇標題及各篇中的小標題係校訂者所附加，又「（一）號內之英文中譯亦係校訂者所譯，不妥處概由校訂者任其咎。」

方東美先生全集編纂委員會謹識

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目錄

一	第一講	緒論——泛談學者對中國學術傳統精神應有的體認……………	一
二	第二講	談宋儒之「學弊」的歷史因緣……………	二一
三	第三講	談正確的道統觀念必須旁通統貫知常識變……………	三五
四	第四講	談宋儒所傳承的學術傳統與時代背境……………	五一
五	第五講	讚歎我民族之美質感喟於人心之萎靡……………	七一
六	第六講	談宋儒立身治學的偉大風範……………	八五
七	第七講	談濂溪太極圖源出於道教非儒家道統之傳……………	一〇三
八	第八講	談「太極圖」之價值遠遜於「通書」朱註亦多誤釋……………	一一九
九	第九講	比較「易緯乾鑿度」與「太極圖說」的哲學價值……………	一三九

一〇	第十講	周濂溪未得「孔孟真傳」……………	一四九
一一	第十一講	教室抒感：國命艱危憂思多……………	一六九
一二	第十二講	談周濂溪對宋明儒的影響……………	一八七
一三	第十三講	從周濂溪談到邵康節……………	二〇七
一四	第十四講	儒學復興的關鍵人物之一——邵康節……………	二二五
一五	第十五講	邵康節的擬似科學的宇宙觀……………	二二九
一六	第十六講	皇極經世的中心思想……………	二四五
一七	第十七講	從邵康節到張橫渠……………	二六七
一八	第十八講	大氣磅礴的張橫渠……………	二八九

第一講 緒論——泛談學者對中國傳統學術精神應有的體認

一、宋儒之自居正統與排斥異端

諸位同學：今天我們開始來談「宋明清哲學」，這一門課，我又稱之爲「新儒家哲學研究」。我採用這一個名辭，並不是因爲我好新奇，事實上，在這個題目下所談到的，大部份是宋儒，一部份是明儒，再有一部份牽涉到所謂從清初到乾嘉時代的清儒。從其中可以發現派別是很複雜的。

我們現在假使把宋史打開來看，在這部正史中，既不像史記中的「仲尼弟子列傳」或是以後歷代正史所沿用史漢舊例「儒林傳」這一名辭，而是獨特的標立出一個很惹人注目的新例目——「道學傳」。這個新名辭是元代重修宋史時創立的，好像宋儒在中國哲學的發展上面——尤其是儒家哲學的發展——已經取得很大的威權，兩宋諸子即已直接紹述孔孟真傳，而繼承了學術正統的地位。而同時在北宋五子以至於南宋諸儒的許多「道學家」們，也深心自許在生活上表現了「聖者氣象」而處處代聖人立言。所以「道學傳」之成立，似乎即是表示全社會公認了他們學說的權威，並就「道學家」們的言行看

來，也似乎自我肯定了這方面的地位。這不過是一般人的看法，而且也是他們自己對學術成就的自我判斷。

但是，據我們研究這一個時代的思想，從北宋起，經南宋、明代，以迄於清之乾嘉時代，在這麼一個漫長的時期裏，有一個很怪異的現象，而兩宋諸儒尤其如此。就是都自稱爲孔孟眞傳，而不免互斥異端，彼此攻訐起來，絲毫不留餘地。比如說朱陸異同、程朱陸王之爭，同是儒學，皆宗孔孟，而自詡眞傳，爭奪正統。這種情形，擾攘了好幾百年，而互有消長，依然是爭端未決。在這些「道學家」們的心中，都橫亘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得孔孟之眞傳，而「代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以眞理自許，豈得不對內爭正統，對外攻異端。於是關楊墨、關老莊、關佛、關禪，一切皆是異端邪說，而攻訐不留餘地。

至於儒家本身呢？是否就是眞理在握了呢？其實不然，比如明代的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〇二年），就在王陽明在世，而王學盛行的時候，站在自然主義唯物論的觀點，毫不保留的攻擊王陽明，連帶的攻擊了朱子。甚至於明代的東林學派，如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即站在王學嫡系的立場而反對王陽明。此外如明末遺老王夫之——船山先生，他可說是在宋明儒之後，哲學上最有成就的一個人，也從他「人文化成」的觀點上面，攻擊陸象山乃至攻擊了王陽明，說他們是打着儒家的招牌而宣揚佛老的邪說，是冒牌的「異端」！下至於顏李——尤其是顏元，大倡其「減一分程朱，得一分孔孟。」宋明理學家簡直成了「孔孟眞傳」的絆腳石了。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宋明諸儒遑念及此！再說到戴東

原，在他所著的「緒言」即「孟子字義疏證」這本書裏面，他批評程朱的學說，說他們的學說不僅方法上充滿了錯誤，概念上也有許多混淆，從戴東原的觀點看來，有一句名言說得好：「宋儒以理殺人，死矣，不可救矣！」

由此看來，宋明清儒家的哲學，無論你用什麼名稱去稱呼它，「道學」也好，「理學」也好，「心學」也好，「性理學」也好，或者是「新儒學」也好；名稱雖有不同，而內容自是一般；其本末原委，同流異勢，以種種不同的方法，成就了不同的哲學思想與見解。如今研究起來，確是頭緒紛繁；對他們要作適當的評價，也是非常困難的事。何況他們黨同伐異，彼此否定，當然是尤增煩惱了。

今天，有些研究宋明儒學的學者們，也據宋史「道學傳」的觀點如法泡製，以為宋明儒果然是上接孔孟真傳，為學術之正統。治學不能遠述到先秦時代，對所謂兩漢經學的闢難與錯誤也懵然不知，如此就代宋儒立言，代明儒立言，說他們是「真傳」、是「嫡系」、是「正統」。因此自己也就堂而皇之扭扭承了宋明儒，而自尸了「孔孟真傳」、「儒學正統」的地位了，就學論學，兄弟實在不能苟同！

二、宋儒之「束書不觀」與今儒之「新八股」

我何以不同意這種看法呢？因為從宋學的立場而言——無論是從宋明儒本身的立場或是從以宋明儒「嫡傳」自居之現代學者的立場，一般皆認為漢儒之學一無是處：在學術上面是支離破碎，在方法學上

面也是遠離正題。然而，今天我們來談漢儒，在思想史方面，儘管漢儒之「微言大義」，不免於以雜家及陰陽家的思想裁賊到儒家正統思想之中，去歪曲它，去誤解它！這種現象當然是我們後代的人要糾正的。但是，所謂漢儒也不是一個單純的學派，無論是今文經學或是古文經學，他們都有一個嚴正不苟的工作，就是所謂「解詁」，解詁的用意在於透過章句訓詁而能够還原到儒家的真面目。比如講到孔孟的學說，就從文獻方面、章句、字源方面，去如實的講明論孟的經典大義，而還出那一個時代的真正意義。假使從這一方面來看，漢儒也未可厚非。而且漢儒面對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從不敢苟順私意，亂發議論，儘可能的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一分師承做一分文章。這在漢儒而言，叫做「師法」，或者是「家法」。比如講詩，魯詩有魯詩的講法，齊詩有齊詩的講法；講周易，魯學有魯學的講法，齊學有齊學的講法；其他諸經，莫不如此。是絕對不能亂講的。漢儒的這種精神成就是我們不能否認的！而反觀宋儒，從北宋五子到南宋諸大家，這一點就沒有做到！僅就文獻的處理方面而言，說得好一點，是隨意解釋——憑藉一己的聰明而自詡為孔孟的真解。嚴格點說，他們犯了唐代以後許多佛家的錯誤——「束書不觀」。

談到「束書不觀」，就歷史因素來說，盛唐之後，社會上成立了許多佛教的「大叢林」，由於戰爭頻仍，天下大亂。盜賊橫行，人民的生命財產一無保障，唯此大叢林的寺廟受到社會上及政治上的保障，而成爲一般富貴家庭的子女玉帛的安全庇護所。因而，「大叢林」也成爲社會上財富集中的地區。寺廟中的和尚在銅臭熏灼的情況下，一下子從崇高的宗教精神世界上墮落下來，掉到赤裸裸的經濟生活

的現實世界中，除了極少數的大德高僧以外，極大多數的和尚們就此濫俗無聊，自然而然的，佛經就塵封在藏經樓中而「束書不觀」了。

佛教如此，道教也是如此，比如清代在北平的道教白雲觀裏面，藏了最好的大明道藏版本，而用黃綾包裹放在玻璃罩下，一塵不染。即使給高明的古董商掉了包，那些道士們也許還蒙在鼓裏呢！這種情形猶如今日在我們某大學的哲學系裏，關於中世紀宗教哲學這一方面的藏書之豐富，不僅在大陸的大學無出其右，臺灣無出其右，甚至據我在美國所參觀的三十幾所一流大學中，也無有出其右者，這樣豐富的藏書而且是最好的版本，現在已成了無價之寶。如今水漬蟲蛀，殘缺不全，甚至有的根本就不見了，如此「毀書不觀」，今人尤勝古人啊！

話說回來，就宋儒的一般精神現象而言，近儒劉師培用了一個名詞稱之為「廢學」。什麼叫做「廢學」？就是把儒家的經典束之高閣而根本不看，而在那個地方打坐，美名之曰：「靜坐觀心」；然後說幾句門面話，這些話不但別人聽了不懂，連自己也不知所云。顏習齋譏之為「打諢猜拳」（見存學編「由道」章）。這種「捉風聽夢」的「彷彿口角」，徒然費人猜疑，究竟有何意義，真是天曉得了。然而，現在有許多講宋學的人，甚至束宋人之書而不觀，在那個地方自說自話。從而代周濂溪立言，代二程立言，代朱熹立言，代陸象山、王陽明立言，彷彿是毫無瑕疵，儼然是宋學泰斗；假使你也是束書不觀的話，就要信以為真了。其實他們儘說些沒證據的空話，在精神上遠不如漢儒之踏實；在思想上也沒有宋儒精深，祇是以宋儒的套語來裝飾門面。我稱之為代宋儒立言的新八股。今天，瀰漫在知識界中的

現象，是紛紛束書不觀而自說自話，卻又自居爲權威。這就造成初學者莫大之困難了。

三、宋儒之「道統」觀念之商榷

再有一個很大的困難，是牽涉到中國學術史方面。比如就孔子而言，孔子以其開闊的心胸，曾經適周問禮於老子，作了一番談話之後，孔子出來向弟子讚歎着說：「其猶龍乎！」此外如與齊太師語樂，聽到了韶樂、專心的去學它，甚至於「三月不知肉味」。又學琴於師襄，師事於襄弘。不僅如此，對於蘧伯玉、鄭子產，也都認爲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他從來沒有板起面孔，說別人的學說是異端邪說，而去排斥它。孔子在學術上面的虛心坦懷，兼容並包的宏大氣魄，可說是春秋以前一般的學術風氣。那時有所謂「師」、有所謂「儒」。「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註：見周禮天官太宰）這就是春秋以前所謂的「師氏」、「保氏」。前者施以道德教育，使人民養成偉大的人格；後者施以六藝教育，使人民去瞭解當時一切學術的內容。「六藝教育」並不是始於孔子，但是後世談「六藝」都要折衷於孔子，爲什麼原因呢？就由於孔子博採眾家，不拘於一說；虛心坦懷，不先有成見。他周遊列國，到處訪求賢人，搜集資料，然後才能刪詩書，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然而，在孔子現存的言論中，沒有一句是攻擊別人的！他虛心的面對着過去優美的文化傳統，坦然的接受當時代合理的解釋與思想，那裏會去排斥「異端」哩！

但是到了孟子的時代就不同了。一方面由於當時道家演變爲法家的趨勢很顯著；同時所謂楊朱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大爲盛行；而墨家尤爲一時之顯學，其聲勢幾已凌越儒家，構成了「楊墨之言遍天下」的形勢。孟子站在儒家的立場，看出了這個危機。於是他不從學術的立場，去指證出楊墨的錯誤，而逕斥其「無父無君」，比之爲「洪水猛獸」。其實，墨家的思想無論從宗教方面或是科學方面，即使是哲學方面，就學術史而言，都有很重要的成就。而孟子一舉抹煞他們的價值，其主要原因是他對他自己的道統觀念和歷史觀念執持很深；他從一治一亂的歷史進程中，以爲「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於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王繼起，一脈相承，孟子尤其尊崇孔子的精神成就，認爲孔子即是這古代中國文化精神一脈相承的一個集大成者，是一個博厚高明足以德配天地的偉大聖人。凡是貶低或是排斥這種精神成就的人，孟子就毫不遲疑的起而辯護；凡是橫遮在這個一脈相承的聖王系統中的學派，孟子就要以衛道者自居，痛斥其爲異端邪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他這些話就是最好的說明。他無形中爲後代開了個「道統」的觀念。儘管孟子有「浩然之氣」，此「浩然之氣」流行的境界是「上下與天地同流」，其精神氣魄宏大無俦，卻也缺少寬容的心量，在中國學術史上，成爲「道統」觀念的始作俑者。

此後「道統」觀念的發展，比如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的太史公自序裏，就自信學術方面的成就，確實可得到中國古代最好的精神文化的傳承。因爲司馬遷家學淵源，他父親司馬談即是掌管周王朝的歷代文獻，對於古代的學說派別可說是十分清楚。而司馬遷本人幼承家學而且天才卓絕，尤其青出於藍。

在歷史學方面，無論就「才」、就「學」和就「識」、就「德」，無一不充分具備。所以他下的歷史判斷很少有紕謬的地方。他够資格有這份精神上的自負——得道統之傳。至於班固無論那方面都遠遜於司馬遷，所以他對司馬遷有所微辭，也就不足道了！可是後世很多學者們，才學識見連班固都不如，卻把孟子、司馬遷以來的維護道統的觀念深植在心中，故步自封，就越發顯得鄙陋了。

不過，如果我們觀察一下有漢一代的真正「老師宿儒」，像是傳詩的申公、傳詩、書的轅固公等，真正是當時學術界的權威，經學的祭酒；可是他們從來沒有擺出一付「道統」的面孔來貽誤後世。然而董仲舒則大謬不然。

談到董仲舒，當然他有他的努力，他的學問，也有他人格的優點；並不能一概抹煞。但是單就學識這方面而言，若就儒家思想的本原來說，董仲舒就很有問題了。有關「尚書」這方面，他只接觸到「五行」之說，對於「皇建有其極」的「皇極」。那只是一個口號而已。至於周易——孔子及其門弟子研究最有心得的儒家根本經典，他根本不瞭解，所以當他面對年輕而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提出很多頗有份量的哲學問題時，就顯得窮於應付，而答非所問了。所以在「天人策問」中，祇好拿尚書中的門面話來敷衍，並且杜撰了一句話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就憑這句話，我們知道董仲舒對尚書是外行，周易是外行，就是對整個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演進的大勢也全是外行；充其量，他對古代神秘主義的宗教轉變到理性支持的哲學，在轉變過程的樞紐方面，他只看出前面的一部份——宗教方面所烘托出的精神領域的永恒性。這就是宗教哲學上所謂的“Philosophy of Eternity”（永恒不變的哲

學)。這個「永恒不變的哲學」在尚書所載的堯舜、禹湯之際的思想還略見端倪；但是夏殷以後，由於文獻不足徵，不僅在學術上找不到證明，在生活的體驗上，也沒有事實上的根據。董仲舒本人是公羊家，是歷史家。他認為歷史應該是不變的歷史，從堯舜禹湯到文武周公，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從人民的生活到民族的經驗，以至於一切典章制度的建立，都應該是一成不變的，假使一變就成了什麼呢？所謂“a change for the worse”——變壞了！——變就變壞了！這是什麼樣的歷史哲學？可說是既無「才」，又無「識」，也無「學」的歷史學家！由董仲舒這樣的歷史學家來講歷史，也祇有打着「公羊家歷史哲學」的招牌來大談所謂「災異」了！就拿這個「災異」來嚇唬漢武帝，來掩飾他的不學。像他這樣一個儒家，正如同戰國時代的雜學，以無本之學，虛詞搪塞，以悅君主而充博學而已！

四、「道統」觀念起於孟子而成於董仲舒

董仲舒提出這樣一種「道統」的觀念，進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斲傷了西漢以來蓬勃發展的文化精神，也削弱了我民族思想的創造活動，封閉了寬宏大度的民族心胸；即使所謂三代以來至於春秋戰國期間，活活潑潑的學術生命，也幾乎一起斷送了！回過頭來看看儒家，我們才曉得，何以荀子在非十二子篇裏分儒者為「大儒」、「雅儒」，然後有「俗儒」、「賤儒」。我們從整個漢代儒者的精神氣象來看，荀子的指斥是確然有其事實根據的。在這裏，我常佩服司馬遷，他在討論秦漢以來經濟、社會

的歷史變遷時，他確認如果歷史不能循創造的過程而向前拓展，就必然形成歷史的墮落！所以首先從經濟問題上着眼，他用了一句話，叫做「漢承秦弊」。這一句話可說是打了個歷史的通關！據此以觀，我們也可以說魏晉是承漢弊，六朝是承魏晉之弊，隋又是承六朝之弊；如此以往，唐承隋弊，宋承唐弊，元承宋弊，明承元弊，以至於今。司馬遷巨眼深識，把歷史根本精神上的錯誤與弱點一語道破。所以他在寫儒林傳的時候，一開頭就發為浩歎：「余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司馬遷何以發為浩歎，細說根由，也是其來有自的。原來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在品學修養上還比不上陳勝。陳勝還知道立博士，許多所謂儒家的博士還要抱遺經、禮器去歸附他。但是漢高祖平生最恨的是儒生，甚至取儒生之冠為溺器。像這樣一位開國君主，如此作賤文化，如非另有緣故，漢代的壽命傳到呂后就該斷絕了！繼之而起的文帝、景帝都是信仰「道家」——但是「道家」這個字我是不亂用的——真正的道家是老子、莊子，這叫做“Taoism”是“Taoist”。而戰國時代的神仙家、方士，一直到東漢末的五斗米教，六朝時的寇謙之，及以後的鍊丹派、符錄派；都可說是與純正的哲學家的道家之關係非常之少，而且誤解得出奇！所以我時常造一個名詞，叫做“Taoist”，他們是所謂“Self-styled Taoism”（自封的道家），他們自命為道家，其實是道家的曲說、邪說。而文景之世號稱的道家實際上是黃老之說，是如西漢初年河上公之流的神仙方士之說，或是如黃生之言的君人南面之說。與純正的道家哲學思想可說是不相干！在這段「道家」思想流行的時期中，而真正的儒家在治學方面卻卓有成就。但在生活上人格上也飽受摧殘。比如當時學術之祭酒，傳詩的申公，起初受到楚王英的尊禮，不

幸這個太子戊是個十足的執紼子弟，驕縱難馴，遇着這麼一個嚴正不阿的大學問家做老師，那怎麼受得了。於是等他父親一死，馬上就「胥靡」申公，什麼叫做「胥靡」申公呢？就是給申公受了「腐刑」。那真是奇恥大辱啊！再有傳齊詩的轅固生，也是個年高德劭的大學問家。而竇太后好老子書，召他去談老子，轅固生說：「此是家人言耳！」這不過是一家的學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竇太后大怒，立刻命令把他送到野豬圈裏去，幸虧他的學生漢景帝知道他的老師無辜，暗中遞給他一把利刃，才救了他一條命！由此可知漢代從漢高祖的老粗作風到文景之世的黃老之學的專斷獨行，一直要到漢武帝的時候，儒家才勉強熬出頭來，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道統固然是立了，儒術固然是尊了，可是漢初經生之業的性質也變了。首先是漢初嚴守的「師法」與「家法」——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一分師承做一分文章——一變而立博士弟子員的「官學」。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參閱劉師培的「國學發微」。這種「官學」實際上可說是帝王所安排的利祿之途。是誘使一批「賤儒」做他的御用工具，那些博士弟子員爲了爭那丁點兒利祿，紛立門戶。可說是講「詩」的反對「書」，講「書」的反對「禮」，講「禮」的反對「易」。彼此假學術之名，爭利祿之實。漢初「師法」、「家法」之專門之學，早已名存實亡。所謂儒者，祇曉得逢迎皇帝，諂諛取仕，像公孫弘以迎合取寵，以面諛得倖，然後陷害忠良——董仲舒的性命差點就送在他的手裏！此外像張禹這樣不學無德的人，也可以掌握了學術界的大權。